

DOI:10.16436/j.cnki.52-5023/d.20240718.001

#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贡献

石云霞

(武汉大学,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统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纵观世界大势,深刻洞察和分析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世界格局演变的新特点,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提出一系列重大外交战略新判断新思想,果断调整了我国对外政策,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赢得了有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树立了反对霸权主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光辉的国际形象。认真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对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和平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独立自主;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中图分类号:**D82;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24)04-0026-09

邓小平是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战略家。他深刻洞察和分析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世界格局演变的新特点,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提出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提出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出和确立处理同外国党关系的重要原则等一系列重大的外交战略新判断新思想,果断调整了我国对外政策,开创了中国外交新局面,赢得了有利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树立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光辉的国际形象。认真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对于我们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 一、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国际形势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就是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这是邓小平外交战略思想形成的前提和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邓小平多次提出并且反复阐述时代问题,阐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他指出,“现

收稿日期:2024-04-2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研究”(项目批准号:21&ZD029)、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意识形态建设的伟大创新与基本经验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石云霞,男,河南太康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sup>[1]105</sup>党的十三大报告把邓小平这一重要思想概括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一思想,高屋建瓴,是对当代世界形势的科学判断和精辟概括。

### (一) 对国际形势判断的重大转变

邓小平指出,我们党过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重要的转变,其中第一个转变,“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sup>[1]126-127</sup>

邓小平作出这一新的重大判断,是基于对世界大势和我们周围环境的缜密思考和科学分析。主要有以下三点:第一,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第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增长。真正支持战争的是少数,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第三,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国际竞争的重点日益转向经济技术方面,机遇稍纵即逝。邓小平由此得出结论,指出“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sup>[1]127</sup>他认为,“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sup>[1]233</sup>,“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sup>[1]25</sup>

### (二) 和平问题本质上是维护世界和平,防止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问题

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在谈到国际形势的时候就指出,现在,“国际形势也是好的。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因为我们有毛泽东同志的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和外交路线,可以搞好国际的反霸斗争。另一方面,苏联的全球战略部署还没有准备好。美国在东南亚失败后,全球战略目前是防守的,打世界大战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sup>[2]77</sup>中日、中美关系的改善,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国际环境的改善,更加深化了邓小平对世界和平问题的认识。1982年8月,他在会见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时的谈话中说,“我们不是悲观主义者,我们只是提出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说,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sup>[2]416</sup>1983年3月,他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到国际形势的特点时,强调指出世界大战短时间内打不起来,以后他又多次阐述这一思想,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结论性的观点,就是1985年6月4日他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所阐明的对国际形势的判断的重要转变,即“第一个转变”。

### (三) 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and 解决

关于发展问题,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邓小平指出,发展问题不但是当今世界的“核心问题”,而且是整个人类的发展问题,强调“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sup>[1]282</sup>

第一,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紧迫问题,关系到整个世界经济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早在1974年4月,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的发言中,就已经十分关注并阐明了这个问题。进

入 80 年代,他进一步指出,“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sup>[1]56</sup>这是不仅因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极端贫困落后的面貌亟待改变,而且发展中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是推动整个世界经济的基本因素和最重要的基础。他指出,现在世界人口是四十几亿,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本质上是整个人类的发展和繁荣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整个人类就难以发展起来。

第二,发展问题也是发达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能不能继续发展的问题。邓小平还特别指出,发达国家不要担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他以中国为例,指出中国这么一个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如果中国发展了,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sup>[1]106</sup>

所以,对于发展问题,要从全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sup>[1]282</sup>邓小平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一是主要靠发展中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振兴民族经济;二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要团结奋斗,相互交流和学习,搞好南南合作;三是解决南北关系,推动南北合作。发达国家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实际上这也是帮助发达国家自己。所以,解决这个问题是国际社会必须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

#### (四) 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当代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凸显并成为时代主题,表明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昭示着当今世界全局的发展大势。但是,前进的道路又是艰难曲折的,和平与发展还只是一个经过努力才能争取实现的目标。

1990 年 3 月,针对当时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宣布冷战结束的时局,邓小平指出,“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sup>[1]353</sup>“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sup>[1]383</sup>这些重要判断,符合当今世界格局新旧交替的历史特点,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下长期被掩盖着的各种政治矛盾、经济博弈以及民族、宗教和领土纷争一股脑地涌现出来,致使局部地区新的危机、动乱甚至战争接连发生,所以争取和平仍然是非常紧迫的任务。邓小平指出,“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sup>[1]344</sup>所谓“一个冷战结束了”,是指苏联解体后美苏之间的冷战结束了。所谓“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是指西方国家强化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内政的干涉,如七国首脑会议对中国的制裁,就是霸权主义兴风作浪,企图把他们那一套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邓小平指出,“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



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sup>[1]321</sup>“只讲一个道理: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sup>[1]320-321</sup>

发展问题更加严重。世界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更为严峻,特别是一些最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仍然处于饥寒交迫之中。对于“世界上的国家富的愈富,穷的愈穷”的状况,邓小平指出,“看来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中国有句话:愈富的人愈吝啬。要富国多拿点钱出来,它不肯,技术转让更不愿意。”<sup>[1]20</sup>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要摆脱超级大国的掠夺和控制的问题,是一个维护自己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的问题。在国际关系中,霸权主义和发达国家总是欺侮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干预、控制、剥削、掠夺发展中国家,阻挠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国家独立和自主所做出的努力。所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维护独立、主权的任务还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因此,第三世界要联合起来,共同努力奋斗”。<sup>[1]289</sup>

##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和“总政策”。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因此,必须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通过建立新型的党际关系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

### (一) 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

邓小平指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们真实的政策,是我们对外政策的纲领。”<sup>[2]417</sup>他还强调说,这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总政策”,是我们制定的“中国的国策”。这些重要论述,高度凝练和概括了邓小平提出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和根本方针。

第一,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共同需要。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sup>[1]116</sup>这是因为,“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sup>[1]116-117</sup>他还严肃批评了那种认为“中国好战”的荒谬论调,他指出中国最希望和平,最不希望发生战争。

第二,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我们一项重要的任务。邓小平指出,中国革命胜利后,一直奉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支持一切被压迫民族独立和解放斗争的政策。这个任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争。反对霸权主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人民虽然站起来了,取得了人们不敢轻视我们的资格,但是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总在欺侮我们,干涉我们的内政。我们还有一个台湾问题没有解决,仍然面临着完成国家统一的任务。反对霸权主义,是邓小平的一个伟大战略决策。他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深刻分析国际形势及其走向,准确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提出了我们在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其中第一件事,就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sup>[2]239-240</sup>他指出,反对霸权主义这个任务,每天都摆在我们的议事日程上。大量事实表明,虽然霸权主义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世界人民命运的时代已经过去,但是霸权主义还要继续横行下去,霸权主义仍然是战争的根源,反对霸

权主义也就是维护世界和平。“总之,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始终是作为一项严重的任务摆到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的日程上面就是了。”<sup>[2]240</sup>

第三,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邓小平指出,从政治角度说,可以明确地肯定地讲,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现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一心一意搞经济、搞建设。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当然,发达国家会对我们戒心更大。”<sup>[1]320</sup>

### (二) 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第一,独立自主是我们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和立足点。1982年,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sup>[1]3</sup>这既是对我们党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世界的庄严宣示。不仅指明了我国外交继续前进的方向,也明确了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要增强我国的政治分量、影响和威信。他强调,我们中国人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人的牌。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不搞政治游戏,不搞语言游戏。我们讲公道话,办公道事,说到做到,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

第二,在国际上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树立国际形象至关重要,关系到我们的国格、国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邓小平多次强调,在对外交往方面,要树立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针对1989年春夏之交中国平息暴乱后七国首脑发表宣言制裁中国的霸权行径,邓小平指出,他们有什么资格!谁给他们的权力!中国人吓不倒。庞然大物不过是纸老虎,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不管国际风云怎么变幻,中国都是站得住的,对我们的任何干涉或吓唬都会落空,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

### (三) 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

第一,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是中国对外政策的根本方针。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就是第三世界的兴起。第三世界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邓小平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一贯的,有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反对霸权主义,第二句话是维护世界和平,第三句话是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或者叫联合和合作。为什么现在我特别强调第三世界这一点,因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对第三世界有特殊的意义。”<sup>[2]415</sup>所谓有特殊意义,就在于第三世界是霸权主义的受害者。二战后,第三世界实际上没有什么和平,战争不断。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所以这就决定了有切身利益的第三世界是真正的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力。

第二,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当头。1974年4月,邓小平在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指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

界。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多次反复阐述中国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指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现在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富强起来,仍然属于第三世界。中国和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命运是共同的。中国永远不会称霸,永远不会欺负别人,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sup>[1]56</sup>

### 三、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

#### (一)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中国的对外政策

邓小平指出,“我们对外政策还是两条,第一条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条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这两条要反复讲。”<sup>[1]353</sup>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主要是解决南北问题,即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不平衡问题。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他强调,“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sup>[3]</sup>这个理论,其核心要义,就是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

#### (二) 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原则

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当建立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反对任何国家违背这些原则,在任何地区建立霸权和势力范围。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就应当坚持各国的事情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总之,“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sup>[1]330</sup>

#### (三) 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邓小平指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sup>[1]359</sup>中国永远不允许别国干涉内政。

1981年4月,邓小平在谈到发展中美关系的原则立场时,就严肃批驳了美国报刊和一些人说什么“中国现在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的错误论调。邓小平指出,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一定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原则。中国是很穷,但有一个长处,就是中国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较强,还有就是穷日子过惯了。延安时期我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都能够生存下来。现在如果一切国际通道都切断了,我们也能够生存。他还批驳了“如果美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像台湾这样的问题,中国可以吞下去”的论调。1990年7月,邓小平在谈到西方一些国家针对中国平息在北京发生的暴乱对中国实行的制裁时,他指出,“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我们的社会制度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的,人民拥护,怎么能够接受外国干涉加以改变呢?”<sup>[1]359</sup>



#### 四、处理同外国党关系的重要原则

在国际关系中处理好党际关系是各国政党的一项极其重要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深入思考和全面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同外国党关系的重要原则，通过建立新型的党际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国家关系的发展，推进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进程。

##### （一）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

各国党在决定本国问题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这是对我国独立自主的对外关系原则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我们党在处理党际关系问题上的首要原则。

邓小平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根本经验教训就是，各国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决定自己的政策，才能取得成功。他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大量的历史事实多次反复阐述这个问题。“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只有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道路和走这条道路的方式，这就是独立自主。”<sup>[4]881</sup> 邓小平指出，各国在实际的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由于主观和客观各种因素的制约和限制，“犯错误是难免的，但犯了错误自己总结经验，这个经验才可靠。”<sup>[4]881</sup> 这同样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当然，也有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这同样体现了独立自主原则。

##### （二）必须坚持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原则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对于党与党之间，什么样的关系才是正确的和正常的，这是一个长期没有解决好的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坚持两条基本原则，一个是平等相处，一个是相互尊重。

所谓平等相处，就是要坚决反对老子党。邓小平指出，“平等就是没有老子党。老子、儿子的关系实际上是否认了独立自主。”<sup>[4]881</sup> 父子党的关系，说穿了就是要控制别人，在事关别国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攸关的问题上，总是以“中心”最高发言人自居，以评判是非的裁判长、“大家庭”的家长的身份发表具有强制性决断性的意见，谁若是不服从，就是大逆不道。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深有感受、深受其害的。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以致发展到基本上隔断的严重程度。“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sup>[1]294-295</sup> 所以，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历史证明，我们反对老子党，这一点我们是反对得对了。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党与党之间要建立新型的关系，按照这样的原则来做，党际关系和国家关系才能健康发展。

所谓相互尊重，就是各个党之间要相互尊重各自对自己事情的判断和选择，反对以我为主发号施令、指手画脚。邓小平指出，“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对执政党是这样，对没有执政的党也应该是这样”。<sup>[1]236</sup> 邓小平多次批评苏共发号施令、以他们为主的错误做法，同时还指出，在这个问题

上,我们自己也犯了点随便指手画脚的错误。他强调,“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sup>[2]319</sup>

邓小平的深刻的自我批评精神和坦诚风格,表明了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郑重态度,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真正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发展正确的和正常的党际关系的真诚愿望。正是根据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同外国党的关系的这一系列重要思想,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中,制定了著名的建立党际之间新型关系的四项原则,这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按照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发展我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的关系。”<sup>[5]</sup>党的十三大重申了这四项原则,并第一次把它作为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看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一个新的发挥和发展。

### (三) 必须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原则

政党的意识形态性质和政党的对外交往,既有一致性,又有差别性。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一个党可以与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党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也可以与意识形态相异的党建立正常的交往关系。这是符合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的。政党之间意识形态的差异性不应当成为建立正常的党际关系的前提和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是我们党的最根本的特点和最大优势。我们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党际交往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我们党的对外交往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左”的指导思想的支配,我们仅仅把党际交往的对象限定在所谓左派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范围内,而根本不同与我们党在意识形态方面具有差异和不同的西方社会党和其他民族主义政党发展关系,甚至采取排斥、不接触的态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遵循邓小平提出的关于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发展国与国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的原则精神,在党际关系的处理上作出根本性的调整,不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为前提条件。只要愿意遵循我们党提出的建立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除了个别法西斯组织和极端的种族主义组织外,对世界上各国各种不同性质的各类政党和政治组织,我们都愿意同他们积极发展交往关系。从此,以意识形态划线发展党际关系成为历史,开启了以四项原则为前提条件发展新型党际关系的新的历史阶段。那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划线来处理国家关系和党际关系的观点和做法,已经成为历史。



参考文献：

- [1]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3] 邓小平倡议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N].人民日报,1988-12-03(1).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66.

## Deng Xiaoping'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to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i Yunxia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Abstract:** Deng Xiaoping was the core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and a great Marxist strategist. He has taken a comprehensive view of both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looked at the world situation from a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gained deep insights into and analyzed the new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the new features of the evolution of the world pattern, and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new judgments and new ideas on major diplomatic strategies, decisively adjusted China's foreign policy, created a new situation of great-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on a favour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for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established a glorious international image of opposing hegemony and promoting world peace and development. The careful study of Deng Xiaoping's strategic thinking on diplomac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s to promote great power diplomac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peaceful development; opposition to hegemony; independenc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der

责任编辑:刘有祥 邱春华